

元代中国书法在高丽王朝的传播

——以赵孟頫、雪庵为例

康 佳 琦

The spread of Yuan Dynasty's calligraphy in Koryo Dynasty

—— Taking Zhao Mengfu and Xue'an as examples

KANG Jiaqi

The era of the Yuan Dynasty of China just corresponds to the later period of koryo dynast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ere relatively stable. Therefore, the spread of Yuan Dynasty's calligraphy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alligraphy world in the later period of koryo dynasty. Among them, the calligraphers represented by Zhongxuan King and Li Qixian opened up a situation for the smooth popularization of the calligraphy style of the Yuan Dynasty in the Koryo Dynasty. Later, Gongmin King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pread of Yuan calligraphy in the Koryo Dynasty.

Keywords: Zhao Mengfu, Xue'an, Retro, Calligraphy Communication

キーワード：赵孟頫 雪庵 复古 书法传播

一、前言

据现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中韩两国之间的交流自中古以来便已展开，甚至可能更早。韩国高丽时代（918-1392），其所跨越的时间范围基本对应中国的宋辽金元。由于高丽王朝与中国宋辽金的外交断断续续，因而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表现出较为起伏的状况。中国元代所统治的时间恰好对应高丽后期，这期间两国的交往较为稳定，因而元代中国书法在韩国高丽时代的传播，主要体现在高丽后期的书坛。

二、元代书法史的发展

元代书法史时间的界定，也许是受到史学研究的影响，学界通常将其开始时间限定为至元十六年

(1279)南宋彻底灭亡，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算起。这样的研究范围，径直以赵孟頫的书法研究作为元代书法史的开端，不仅会忽略金朝覆灭至忽必烈统一中国这半个世纪书法史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整体把握元代书法发展的真实面貌。正如李修生先生在《元代文化刍议》一文中说道：

“如果从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观点和史实出发，似不应该把元灭南宋统一全国的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或至元十六年（1279）作为元代文化的起点。在此以前，它已经在中国的北部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搬演了壮观的史剧。有很多文化方面的事件和重大成果，出现在元统一全国以前。我们如果从13世纪初叶，也即南宋末、金末、蒙古国建立初期开始，研究这一时期文化，似更为适宜。”¹⁾

一二三四年，金国在蒙古汗国与南宋的南北夹击之下覆灭，蒙古贵族开始占领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其实在此刻元代书法便已经拉开序幕。但是由于政权与军事的对立，蒙元王朝和南宋王朝都在沿着各自旧有的脉络发展，因而呈现出南北文化的差异，进而延伸为对元代书法史整体进程产生影响。正是因为这半个世纪的存在，使得元代书法史的发展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局面。

元代书法史的发展整体呈现出两个阶段，即前期以颜真卿书法为基础，凭借教育的良好发展由北向南进行逐步推广，其影响辐射全国范围；后期以赵孟頫及其影响下的书家为媒介，在“复古”大旗的指引下，赵氏书风迅速扩展为对整个书坛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蒙古贵族最初所占领的区域大多为旧金故土，许多自金入元的文人书法家大多还继承金代后期书坛所流行的新风气，即以唐代书法乃至魏晋书法为指归。因此，元代初期的书坛大部分是由金末遗民书家所组成的以“复古”为中心思想的文人书法家在主导，主要表现为对颜真卿书法的推崇。伴随着赵孟頫出仕元朝，其影响不断扩大，并最终确立了元代书坛的统治地位。颜真卿这一路雄浑古朴的书风相比较于赵孟頫一路书风开始显得格格不入，并最终逐渐淡出元代书坛。取而代之的便是赵孟頫及其影响下的赵派书家，其所倡导温婉秀逸的书风开始逐渐笼罩元代书坛。赵孟頫书风的影响不仅延续到之后的明代书坛，同时也对高丽末朝鲜初期的书坛产生深远影响，笼罩了其近三百年的书坛风尚。

三、高丽王朝书法史的发展

太祖王建元年（918），高丽王朝建立。其后于935年合并新罗，936年灭后百济，重新统一了朝鲜半岛并从此开启了高丽时代。高丽王朝的书法发展与国家教育制度的制定紧密相连。如：太祖王建十三年（930）在西京设立了“成均馆”，并且设置了“书学博士”，开始招收贵族子弟进行书法和儒家文化的学习。光宗王昭九年（958）沿袭唐制设立了科举制度。成宗王治十一年（992）设立国子监，并效仿唐制下设：国子学、太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在高丽王朝近五百余年的历史中，由于以书取仕这一制度的出现，使得书法艺术得到了充足的发展。

高丽王朝书法史的发展大体也可分为前后两部分。高丽前期的书法风尚整体沿袭了统一新罗时期的书

1) 李修生《元代文化刍议》，殷都学刊，第一期，1999年，第58页。

坛风貌，即以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虞世南等唐代书家视为主要学习对象。其中，高丽前期书坛的主导风尚是对欧阳询书法的学习，如朝鲜王朝的著名书家金正喜在《题欧书化度寺碑帖后》中曾说道：“东人最重欧法，自罗代至于丽中叶，皆恪遵渤海遗式矣。”²⁾ 欧阳询的书法，由于其法度严谨、平正峭劲、气韵生动等特点，受到了高丽前期书家的热情追捧，并影响了整个高丽书坛前期的发展。此外，前期书坛中虽然有不少书家对魏晋王羲之书风进行学习，但是不足以与主流书风进行抗衡。这样的书法学习风尚一直持续到高丽时代中期，整个书坛对于欧阳询书体的崇尚持续表现出高度的热情。

当然，一味的固守只会使得书法的学习趋向于机械化，因而势必会有人出现并打破这一僵化的局面。高丽中期一位名叫坦然的书法高僧便是这个打破僵局的开拓者。坦然（1070-1159），俗姓孙氏，《断俗寺大鉴国师塔碑》中曾记载：“年甫八九岁解蜀文作诗有惊人语，又工于书。”³⁾。坦然幼年便展现出惊人的学习天赋，并于十九岁时遁入佛门开始钻研佛法经典，高丽睿宗王侯（1079-1122）奉其为国师，圆寂后谥号为“大鉴”⁴⁾。坦然是一位佛学、书法俱精的高僧，其在看到高丽王朝书坛的时弊后，开始试图去打破固有的“崇欧”模式。坦然的书法打破了当时以欧阳询为旨归的书法学习风尚，开始以魏晋王羲之书法为基础，并结合唐代僧人写经的独特面貌，形成了一种清新秀雅、研美飘逸的新风尚，使人耳目一新⁵⁾。通过观察其仅存的书法作品《文殊院记》（拓片），我们可以看出坦然的书法俨然是王羲之《集字圣教序》的风貌。此外，坦然的继承者机俊，以及僧人慧素、慧观等都为僵化的书坛带来了阵阵新风。书坛的许多书家在固有的僵化学习后，面对这样一种新的风尚随即表现出好奇之心，并试图去学习与模仿。正是由于这些书家大胆的尝试以及对魏晋书风的推崇，才使得高丽时期的书坛不在拘泥于开始发生转变，并为之后赵孟頫书法在高丽后期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审美基础。

高丽后期的书法风尚与前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取法选择。即在跨越过宋代这一中国书法的高峰之后，直接承接元代赵孟頫所领导下的“复古”书风。北宋“尚意”书风虽然在中国书法史的发展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在高丽时代却显得微不足道。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高丽王朝时期较为保守的外交政策，以及与五代、宋的联系较为松懈，因而受到该时期书风的影响较小。整体而言，元代中国书法在高丽后期的传播，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效仿之风。首先是王公贵族的“被迫”学习，紧接着是文人士大夫的“临习”之风，最后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流行”趋势。当然，书法风尚的推崇仅有书家的号召还远远不够，朱子学思想的在高丽后期的有序传播为元代书法的推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北宋年间，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在突破旧有制度的藩篱后迎来新的生长，其在经过数百年的沉浮与积淀后在南宋时期基本成型。尤其是蒙元王朝时期，其在元佑年间直接上升为官学地位，足见其发展速率之猛烈。适时的蒙元王朝与高丽王朝联系较为频繁，且两国间的关系甚为紧密。国与国之间的紧密直接导致了文化思想的融洽交流，高丽末期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开始跨越国界向东传播，进而辐射整个朝鲜地区。元代中国书法正是凭借着儒学思想的良好发展，得以顺利进入该地区并受到高丽王室和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不仅风靡全国进而影响了朝鲜前期的书法发展。

2) 金正喜，《阮堂文集》，卷六，民族文化推进会，1981年，第121页。

3) 秦弘燮，《韓國美術史資料集成》，第一卷，一志社，1987年，第516页，

4) 任昌淳，《韓國の書芸》，近藤出版社，1981年，第38页。

5) 任昌淳，《韓國の書芸》，近藤出版社，1981年，第39页。

四、元代书法在高丽王朝的传播

“惟有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制，悉遵其制。”⁶⁾ 高丽王朝自太祖王建时便确立了其基本国策，即学习优秀的中华文化。如果说留学是统一新罗时代的中韩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那么政治婚姻便是高丽王朝与元朝交流的重要手段。此刻的高丽王朝不仅依旧延续着前朝对中华文化学习的传统，同时也深受蒙古文化的影响。高丽王室与元朝公主的通婚始于忠烈王，其后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恭愍王皆迎娶了元朝公主，可以说后期的高丽王朝与元朝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舅甥之国”的关系不仅促进了上层贵族阶级的交往，同时也带动了两国间文人士大夫间的文化互动。在这一背景下，在元朝首都，即元大都流行高丽风俗。同时，从朱子理学到饮食文化，元朝的文化也传播到了高丽⁷⁾。这其中，书法作为当时不可或缺的交流手段，承载了重要的文化传播任务。元代书法在高丽王朝后期的有序传播，最重要的便是有赖于王室贵族书法学习观念的转变。正是因为统治阶级审美趣味的变化，才使得元代书风得以顺利进入高丽，并为之后的风靡全国打下坚实的美学基础。这其中，忠宣王和恭愍王是元代书法在高丽王朝得以传播的重要“媒介”。

4-1. 忠宣王与赵孟頫

忠宣王（1275—1325），讳璋，古讳源，蒙古讳益智礼普化，高丽第二十六代国王，是忠烈王与忽必烈之女齐国大长公主的儿子，三岁时便被封为高丽世子。“十三年九月忠烈在燕召王入朝。”⁸⁾ 这是忠宣王第一次蒙古之行，此后其一生中多次往返，并且长期居住于元朝。元贞二年（1296）年十一月，王璋迎娶元晋王甘麻刺之女为妻，此刻的王璋不仅拥有着蒙古血统同时又成了元朝的驸马。虽说忠宣王是忽必烈的外孙，但是其政治生涯却颇显坎坷，如《高丽史》中记载到：“壬申太上王饒于金郊，酒酣，使臣李鲁兀，以帝命，取国王印，授逸寿王。於是，太上王复位。王如元宿卫凡十年，武宗、仁宗龙潜，与王同卧起，昼夜不相离。”⁹⁾ 忠烈王二十四年（1298）八月被迫入元，并且在大都生活了十年之久。虽说昼夜不离的生活氛围有些夸张，但是却为忠宣王后期的执政打下了坚实基础。“帝以前王定策功，封沈阳王。”¹⁰⁾ 此刻的忠宣王开始真正掌握高丽王朝权力，并且开始实践其一生的规划，为元代和高丽两国的文化交流开辟了新篇章。

忠宣王对于汉文化的学习是自小便开始的，如《高丽史》中曾记载到：“忠宣为世子入侍元朝，与姚燧、赵孟頫诸公游。”¹¹⁾ 由此可知，忠宣王早在幼年时便已进入元朝，且与元朝的文人士大夫交往密切，开启了对汉文化的研习并深受影响。忠宣王对儒学所表现出的热爱，使得其与同样爱好的仁宗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同时携从臣白颐正等与当时著名的元朝文人阎复、姚燧、程矩夫、萧爽斗、赵孟頫、虞集、元明善、张养浩和王构等结交，并令白颐正等向阎复、姚燧研习程朱之学¹²⁾。忠宣王不仅也为理学在高丽王朝的推广

6) 鄭麟趾等，《高麗史》卷一，国書刊行會，1908年，第26页。

7) 金文京，《高麗の文人官僚・李齊賢の元朝における活動》，《中國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7年，第120页。

8) 鄭麟趾等，《高麗史》卷一，国書刊行會，1908年，第510页。

9) 鄭麟趾等，《高麗史》卷一，国書刊行會，1908年，第515页。

10) 鄭麟趾等，《高麗史》卷一，国書刊行會，1908年，第508页。

11) 鄭麟趾等，《高麗史》卷一，国書刊行會，1908年，第528页。

12) 鄭麟趾等，《高麗史》卷二，国書刊行會，1908年，第260页。

打下了基础，同时其与元朝儒士的密切交往，也为两国文化交流增加了许多机会。如李齐贤的《益斋乱稿》中记载道：

“大德十一（1307）年，王与丞相达罕等定策，奉仁宗扫内难，以迎武宗，功为第一，封沈阳王、推忠揆义协谋佐运功臣、附马都尉，勋上柱国，阶开府仪同三司，宠眷无出右者。仁宗为皇太子，王为太子太师。一时名士姚隧、阎复、洪革、赵孟頫、元明善、张养浩辈，多所推毂，以备宫官。”¹³⁾

由于忠宣王参与了拥立元武宗即位的元朝宫廷斗争，并且获得了胜利，因此受到丰厚的奖赏。此外，因为忠宣王与元仁宗的亲切关系，不仅兼任了元仁宗的老师，并且获得了同当时的名人雅士进行互相学习的机会。姚隧、阎复、洪革、赵孟頫、元明善、张养浩等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文人雅士，与他们进行学术交流的话，一定会受益匪浅。

虽然此刻的王璋已经掌握了高丽王朝的绝对权利，但是其却似乎失去了对王权的热爱，并且由此开启了久居大都的生活，对高丽王朝采取远程传旨的治理方式。政治生涯表现出较为曲折的忠宣王却在元朝与高丽王朝的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忠宣王对于两国间文化的交流主要得益于其在京师创办“万卷堂”，邀请众多元朝大儒汇集于并进行讲学，如《高丽史》中曾记载到：

“忠宣王五年（1313）三月，以长子江陵大君见于帝，请传位。帝乃策焘为王。是时，朝廷欲王归国，王无以为辞，乃逊其位。又以侄延安君暲为世子。王尝封沈王，故时称沈王。忠肃王元年，帝命王留京师。王构万卷堂于燕邸，招致大儒阎复、姚隧、赵孟頫、虞集等与之从游，以考究自娱。”¹⁴⁾

忠宣王为了可以继续留在元朝，便将王位传授于其子王焘（高丽忠肃王），并且不愿再回到高丽。此刻的忠宣王开始在燕京的私邸设立万卷堂，并且招募当时著名的儒者前来讲学。这其中，赵孟頫（1254-1322）作为元代“复古”书风的领导者，对忠宣王的书法学习观念影响较大。二人的交往可以从赵孟頫的《松雪斋文集》中《留别沈王》一诗中一探究竟，1319年4月赵孟頫南还故里为忠宣王作诗送别：

“拙诗留别，驸马沈王阁下，赵孟頫再拜。珍重王门晚受知，一年长恨曳裾迟。分瓠共酌人参饮，临砌同看芍药枝。华屋焚香凝燕寝，画屏摘句写乌丝。吴船万里东南去，采尽蘋花有所思。”¹⁵⁾

从中可知忠宣王与赵孟頫的亲密关系。或许是二人之间相似的命运，使得两人更加互相尊重。该诗不仅留存于文集中，同时还留有书迹流传于世，收录于朝鲜书家李珣的《匪懈堂集古帖》中。此外，忠宣王和赵孟頫还有书法上的合作，1319年冬月刻于浙江省平江路嘉兴州的《大报国圆通寺记》碑后署名：“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撰并序，推忠揆义协谋佐运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尉上柱国驸马都尉沈

13) 李齐贤，《益斋乱稿》卷九，《忠宪王世家》，民族文化推进会，1984年，第23-24页。

14) 郑麟趾等，《高麗史》卷一，国書刊行會，1908年，第527页。

15) 任道斌校点，《赵孟頫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1页。

王王璋篆额。”¹⁶⁾由此可见，忠宣王不仅对汉文化精通，同时也深谙书法之道，才可与元代书坛巨匠赵孟頫进行书法合作。

忠宣王构建万卷堂，不仅是满足于自己的学习需要，同时也为了可以将优秀的儒学传播回自己的国家，让更多的国人得到学习的机会。于是，忠宣王邀请高丽文人李齐贤前来求学，至于为何招募李齐贤来，李穡的《牧隐稿》中曾记载到：

“京师文学之士，皆天下之选。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于是召至都，实延佑甲寅年正月也。姚牧庵、阎子敬、元复初、赵子昂咸游王门，公周旋其间，学益进。诸公称叹不置。”¹⁷⁾

一方面是感叹燕京乃天下文人的汇集之地，另一方面感叹自己府中人才的缺失，遂招募本朝文人前来学习。由于李齐贤本身便有广阔的学识以及书画方面的高超技艺，加之深厚的汉学文化素养，因此很快便融入其中，与这些文学大儒成为了挚友。

李齐贤（1288-1367），字仲思，号实斋、益斋、栢翁等，谥号文忠公。李齐贤在万卷堂与赵孟頫结识并成为挚友，之后对赵孟頫的书法作品大加赞赏，如其曾作诗《和呈赵学士子昂》：

拜笔飘缨紫殿春，诗成夺得锦袍新。侍臣洗眼观风采，曾是南朝第一人。风流空想永和春，翰墨遗踪百变新。千载幸逢真面目，况闻家有卫夫人。¹⁸⁾

诗中对赵孟頫书法的夸赞，不仅称其为南朝第一人，同时赞其书法有卫夫人之风，可谓是对其书法的高度赞扬。此后，二人之间多有作诗互赠的经历，足见交往之深。李齐贤对赵孟頫书法的认同不仅停留在诗文之上，同时也体现在具体书法实践中，如李齐贤在《笔贤后实迹图》中的题跋便俨然是一派赵孟頫书风的体现。

作为元代“复古”书风旗帜领导者的赵孟頫，其书法风格必定会在平日的交流展中潜移默化的对周围人产生影响，忠宣王与李齐贤被赵孟頫书法所感染也不足为奇。二人不满足于自己对新书风的学习，同时祈盼将这种书风带回高丽，为僵化已久的高丽书坛带来新鲜活力，因此便有了朝鲜文人徐居正在其《笔苑杂谈》中的记载：

“窃谓高丽忠宣王入元朝，构万卷堂，日与当世名儒六七人从容谈论，赵公其一也。我国文儒如李先生齐贤，侍从亦多，王之东还，文籍书画驮载万签，赵之手迹满于东方，盖由此也。”¹⁹⁾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忠宣王、李齐贤在与赵孟頫等元代名儒的交往中并不满足于当下的学习，同时在归国

16) 任道斌校点，《赵孟頫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7页。

17) 李穡，《牧隐稿》第十六卷，《鸡林府院君溢文忠李公墓志铭》，第312页。

18) 李齐贤，《益斋乱稿》卷一，民族文化推进会，1984年，第51页。

19) 徐居正，《笔苑杂记》卷一，以会文化社，2001年，第248页。

之际携带数以万计的汉籍字画，得以在回国之后进行更好的学习。这其中，赵孟頫书迹之所以可以大量传播到高丽王朝，并且留存于世的原因便是来源于此。

高丽王朝的书法审美在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固化”之后，终于迎来了崭新的书法风貌即元代书风。这其中，高丽忠宣王与李齐贤作为元代书法在高丽王朝的引路人，其不仅率先在王室内部进行推广，同时也号召自己身边的文人雅士进行学习，为元代书法得以在高丽王朝乃至朝鲜王朝的顺利推行打下了坚实的美学基础。

4-2. 恭愍王与雪庵

当忠宣王与李齐贤将元代书法引入国内后，首先引起的便是王室以及文人士大夫审美观念的转变。当然，仅有忠宣王与李齐贤两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将元代书法推向整个高丽王朝的，将元代书风进一步推广并确立下来还需要更多力量的帮助。另一位拥有高丽王朝皇室身份的恭愍王（王颙），将元代僧人书家雪庵的书法在本国内大力推行。

恭愍王（1330-1374），初名祺，后改名为颙，号怡斋、益堂，蒙古名为伯颜帖木儿，是忠肃王之子，高丽第三十一代国王。现在留存于世的书法作品有安东的“映湖楼”、“安东雄府”与江陵的“临嬴馆”等大字匾额。《高丽史》中记载道：“癸酉，元遣使，召王弟江陵大君祺入朝。政丞蔡河中，前金议评理孙琦、朴仁干等三十余人从之。”²⁰⁾自幼便入元的恭愍王从小便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并因此而积累了深厚的文学修养。不仅为之后的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元代书法在高丽的传播推波助澜。虽说在恭愍王入元时赵孟頫已经去世多年，二人之间不会存在直接师法的可能，但是此刻的元代书坛俨然是一派赵氏书风的天下，因此其受赵孟頫书风的影响是必然的。另外，高丽王朝后期的皇室审美观念也已经向赵孟頫书风靠拢，由于祖父忠宣王是赵孟頫书风的有力倡导者，因而恭愍王对赵孟頫书风自然不会陌生。但是恭愍王并未满足于赵孟頫一家的书法学习，其在入元后广涉多家，书画兼学，并最终成为了元代僧人书家雪庵书法的有力倡导者。如成倪曾在《壙斋丛话》中曾评价恭愍王的书法：

“善书为难，而题额尤为难。以赵子昂之笔法，其题额则推让于李雪庵，况不及于子昂者乎。我恭愍王所书江陵临嬴馆安东映湖楼。真老健非凡人所及也，而江陵馆近被鬻攸失其额，可惜也。”²¹⁾

由此可见，恭愍王不仅是赵孟頫书法的有力实践者，同时其尤爱书写大字，以李雪庵为师法。

溥光（1237-1327²²⁾），俗姓李氏，字玄晖，一作元晖，号雪庵，云中（今山西大同市）人。《云中郡志》中记载道：“喜读书，经传子史无所不窥，善诗工书。”²³⁾时人夏文彦的《图绘宝鉴》、陈基《夷白斋诗话》均对其有简略的撰述。由于雪庵在书法、绘画及诗词等方面均有较高的造诣，因而闻名于当世。但是雪庵的出仕却离不开赵孟頫的举荐，如《星湖僊说》中曾记载道：

20) 鄭麟趾等，《高麗史》卷一，國書刊行會，1908年，第558頁。

21) 秦弘燮，《韓國美術史資料集成》，一志社，1987年，第479頁。

22) 苏显双，《元书家李溥光及其书、论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五期，第50页。其考证溥光约生于1237年，卒年不晚于1327年。

23) (清) 胡文焯撰《云中郡志》，顺治九年刻版点校本，山西省新闻出版局，1988年，第481页。

“人多不知雪庵为何人。大明一统志云，大同府释李溥光，幼为僧，读书工诗，善书法，一时宫城殿宇扁额皆出其手，此即其人也。初赵孟頫见其写酒坊字，甚赏之。遂拔擢之。顾云庆诗话云，元释溥光字玄晖，俗姓李氏，特封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赐号立悟大师。”²⁴⁾

由以上材料可知，雪庵的出仕得益于赵孟頫的举荐入朝，并且是因为其善大字的缘故。倘若没有赵孟頫的举荐，也就没有雪庵的名垂书史，更不会把书风传播到高丽王朝乃至朝鲜王朝。由于赵孟頫的举荐，以及雪庵自身对大字的善于书写，二人书写了大量的碑匾，如叶封的《崇阳石刻记》中评价其大字：“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与赵文敏公名声相埒一时，宫殿城楼匾额皆出两人之手。”²⁵⁾当然，雪庵的书法价值远不局限于元朝范围内，在恭愍王的推崇下，其书风的传播拓展到了高丽王朝。又如《星湖僊说》中记载道：“雪庵之书，传于我东，为堂额之体，谓之额体。”²⁶⁾由此可见，雪庵的书风已经传于高丽王朝。

雪庵的大字不仅影响了高丽王朝后期的书坛，同时也和赵孟頫的书风一样延续到了朝鲜王朝前期，亦可看作是元代书风在朝鲜王朝前期书坛的传播。如《世宗实录》中曾有两段记载：

“传于铸字所曰，校书馆所藏集古帖，赵孟頫证道歌、真草千字、东西铭、王羲之东方朔传、兰亭记、雪庵头陀帖、永膺大君瑛家藏赵孟頫赤壁赋等本，印送成均馆，令学生用为楷模。”²⁷⁾

“颁赐新刊雪庵法帖，于宗亲、政府、六曹、代言司、集贤殿等。”²⁸⁾

由以上记载可知，雪庵的大字不仅被校书馆收为字帖加以保存，同时刊印成册供成均馆的学生进行临摹学习之用。此外，还将雪庵的字帖颁布给多家机构进行传播学习之用。这样的措施充分说明了朝鲜王朝前期整个书坛以及朝廷对雪庵书法的认可，同时也是雪庵书风在该时期良好传播的有力见证。

当然，书风的发展在维持一段时间后必定会产生一些弊端，雪庵书法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也未逃出该法则。又是《世宗实录》中的记载为我们揭示了当时雪庵书法在朝鲜王朝的尴尬境遇，如其记载道：

“受常恭视事。上曰，今朝廷发还处女从碑即执馔唱歌等婢，若奉表谢恩，则先帝之失著矣。但回奏如何，判中枢院事许稠启曰，上教允当，稠仍启曰，今承文院馆写字者不楷正，良由未见好体也。好体莫如晋字。顾求之，使得取法。上曰，予于书字曾不留意，我国人皆尚雪庵体，稍奇特，然未能得体，则其终字样甚陋。莫如晋字，予将求以赐之。又启曰，朱文公近思录，与四书小学相位表里，愿以大字模印，以备睿览，且颁臣僚。上曰，予将从之。”²⁹⁾

朝鲜王朝初期的书坛笼罩着雪庵书风，并且深受国人的喜欢。但是由于没有良好的书学理论基础进行引导，

24) 秦弘燮，《韓國美術史資料集成》，一志社，1987年，第499页。

25) 叶封《崇阳石刻记》卷下六十三，民国十二（1923）年，沔阳庐氏慎始基斋景印本。

26) 秦弘燮，《韓國美術史資料集成》，一志社，1987年，第499页。

27) 秦弘燮，《韓國美術史資料集成》，一志社，1987年，第256页。

28) 秦弘燮，《韓國美術史資料集成》，一志社，1987年，第259页。

29) 秦弘燮，《韓國美術史資料集成》，一志社，1987年，第257页。

在学习阶段仅注重形似而忘却了神采的重要性。因而此刻的书法学习陷入了“字样甚陋”的困境，便开始有人号召学习晋字，并且得到了朝鲜世宗李禔的准许。其实，雪庵的字法便是来源于晋唐诸家，只是当时的国人在学习时没有一个良好的理论基础，才会出现这样的学习困难。

此外，将元代书法传播到高丽王朝后期的不仅有高丽国王，还有来自蒙古贵族的公主。蒙古公主在嫁往高丽之时，会携带大量的古玩、书籍、字画等作为陪嫁之用，一方面满足了个人审美需要，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元朝与高丽王朝的文化交流，书法凭借这样的便利也得到了良好的传播。恭愍王的王后是元朝魏王的鲁国大长公主宝塔失里（？—1365），高丽忠定王元年（1349）与时为世子的恭愍王成婚。其在前往高丽时便携带了大量的陪嫁，如金安老的《龙泉谈寂记》中曾记载到：

鲁国大长公主之来，凡什物、器用、简册、书画等物，船载浮海，今时所传妙绘宝轴多其时出来云。³⁰⁾

鲁国大长公主在嫁到高丽时，其随身所携带了大量的古籍字画。这其中不仅包含有当时流行的赵孟頫书法作品，同时还有其许多书法、绘画作品，对高丽末朝鲜初期的书法与绘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恭愍王和鲁国大长公主传承了忠宣王的使命，源源不断的将大量的学习资料运往高丽，促进了元朝与高丽王朝文化交流的同时，也为高丽国内学习中华文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五、结语

总体来看，元代书法得以在高丽顺利传播的第一人是忠宣王，并且其身边围绕着许多文人士大夫也会跟随帝王观念的转变投其所好，展开对元代书法尤其是赵孟頫书风的学习。元代之所以可以顺利影响高丽王朝的文学艺术审美，主要得益于两国密切的政治关系，并且高丽王室成员可以长时间居住于元朝首都。高丽使团与随行的文人士大夫等也经常出入于燕京，极大的促进了两国文人之间的交流，为高丽末期的汉文学以及书艺等提供了大量新鲜血液³¹⁾。此后的恭愍王与鲁国大长公主良好的继承了忠宣王使命，为两国间文化交流的继续搭建了稳定的桥梁。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随着元代赵孟頫书法传入高丽，一时之间整个高丽王室都为这种新颖而又传统的书体所倾倒，并争相开始进行模仿与学习。这种由高丽王室开始的书法审美趣味的转变，自然会引领整个高丽王朝后期在书法审美上的偏向，这股强大的作用力使得赵孟頫书法乃至元代书风成为了高丽末乃至朝鲜初期独步一时的书风。此外，文人士大夫的争相学习，以及科举制度和印刷术等，都对元代书法在高丽王朝的良好传播产生了重要作用。

30) 金安老，《龙泉谈寂记》卷十三，民族文化推进会，1973年，第124页。

31) 任昌淳，《韩国の書芸》，近藤出版社，1981年，第41-42页。

